





美国《国家地理》

125年

欧洲 EUROPE

非洲 AFRICA

英文版编辑:[美] 鲁埃尔·戈尔登 (REUEL GOLDEN)

设计:[德] 安迪·迪勒 (ANDY DISL)

撰文:[美]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 (DOUGLAS BRINKLEY)

[美] 马克·科林斯·詹金斯 (MARK COLLINS JENK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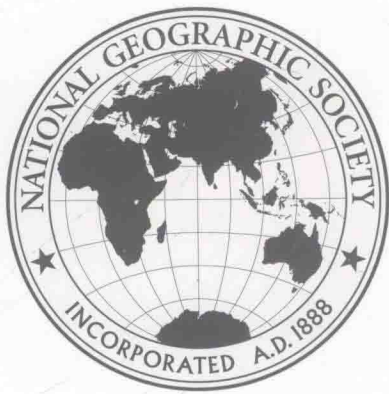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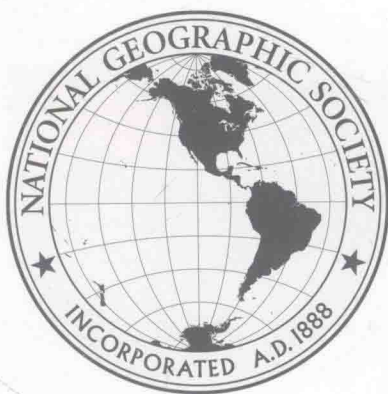
创意:[美] 劳伦斯·席勒 (LAWRENCE SCHILLER)

译者: 李冰清

英文版出版人:[德] 贝内迪克特·塔森 (BENEDIKT TASCHE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TASCHEN







美国《国家地理》

125年

欧洲 EUROPE

非洲 AFRICA

英文版编辑:[美] 鲁埃尔·戈尔登 (REUEL GOLDEN)

设计:[德] 安迪·迪勒 (ANDY DISL)

撰文:[美]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 (DOUGLAS BRINKLEY)

[美] 马克·科林斯·詹金斯 (MARK COLLINS JENKINS)

创意:[美] 劳伦斯·席勒 (LAWRENCE SCHILLER)

译者: 李冰清

英文版出版人:[德] 贝内迪克特·塔森 (BENEDIKT TASCHE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TASCHEN

欧洲 EUROPE

18 — 273

北欧 NORTHERN EUROPE 20

东欧 EASTERN EUROPE 44

中欧 CENTRAL EUROPE 66

西欧 WESTERN EUROPE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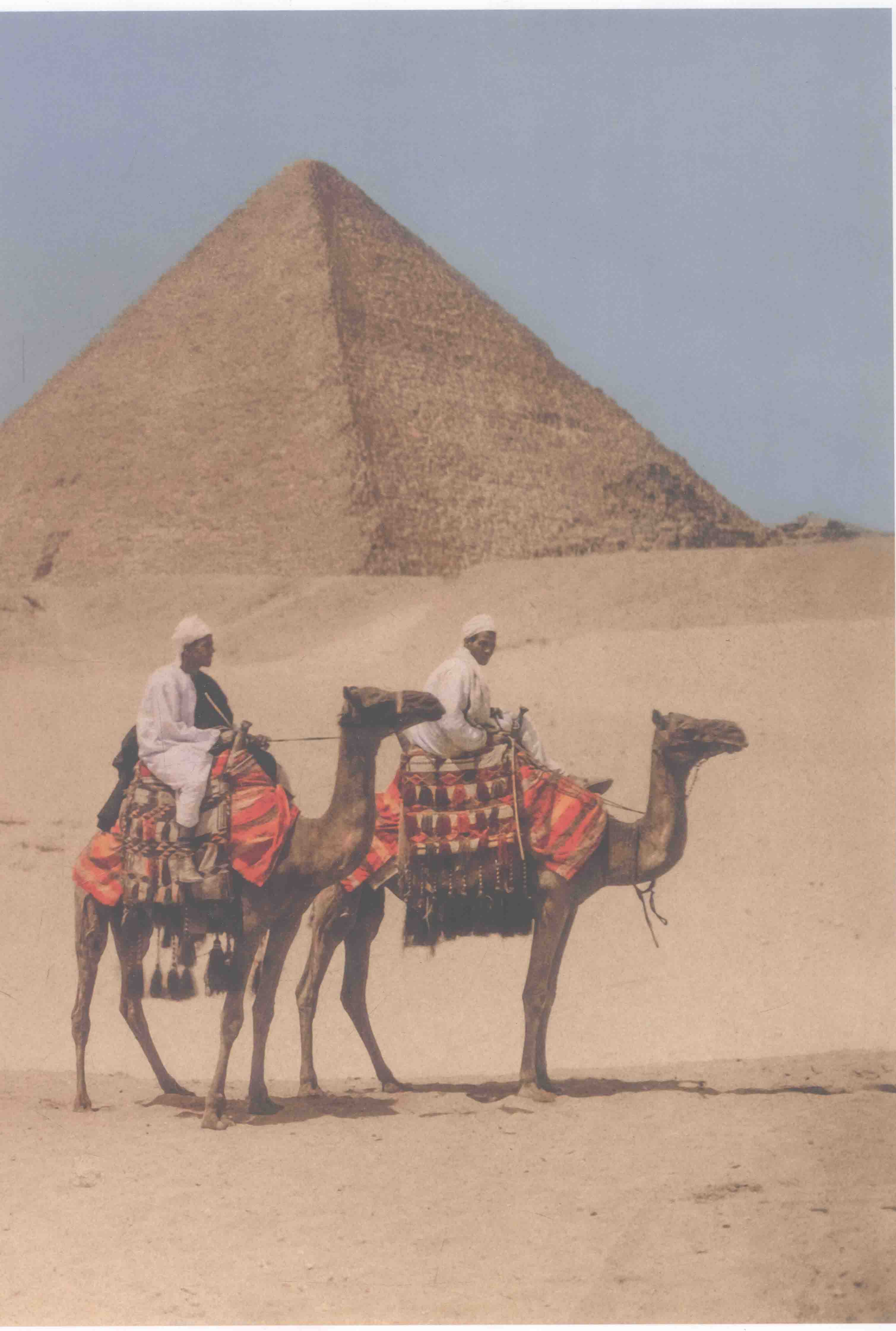
南欧 SOUTHERN EUROPE 178



非洲 AFRICA

274 — 503

北部非洲 NORTH AFRICA 276
中部非洲 CENTRAL AFRICA 344
东部非洲 EAST AFRICA 372
西部非洲 WEST AFRICA 426
南部非洲 SOUTHERN AFRICA 468





新疆域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

根据一份1988年盖洛普公司(Gallup)的调查显示,17%的美国成年人无法在地图上找到美国的位置。国家地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深知其根本使命在于教育,对此难辞其咎,因此捐助了数百万美金用于丰富教师资源、举办地理知识比赛,并提倡在学校日常课程中增加单独的地理课程。协会还与国家科学基金会合作,尝试建立国家地理儿童网络,它使用计算机联网,是高科技商业及军事用途外最早的网络设施。美国的老牌协会在这一点上对未来有先见之明。

把时针快速拨到2013年,“国家地理”已经在全球有了惊人的知名度,涵盖有线电视、印刷、网络、社交媒体、出版领域,Facebook上超过65%的粉丝来自美国以外地区。但无论借用哪一种渠道,国家地理的使命始终如一,这可以用在过去17年中都担任其领头人的小约翰·M.费伊(John M. Fahey Jr.)的话来概括:“鼓励人们保护地球。”其主题可以是地理、动物、植物、考古、自然科学、人类起源、宇宙、自然资源,也可以是摄影。一直以来,我们都希望协会所提供的一切有关地球的那些令人难忘的照片和解说,无论是在这个地球上还是与它息息相关的内容,都可以不断激起人们保护的热忱。

作为一个环境历史学家,我发现一些非直接的信息往往和最饱含情感的编辑内容效果相当。例如,2012年协会发布了大规模的“大型猫科动物倡议”,旨在改变世界各地狮子、老虎、美洲豹、非洲猎豹及其他亚种大型猫科动物数量下降的状况。协会表达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强硬态度,它摆脱了是非对错的范畴,强调必须取缔一些文化中的传统习俗,比如猎杀大型猫科动物。“大型猫科动物倡议”以独立于协会的基金方式汇集捐助,因此能分散拨款来研究问题产生的缘由并测试解决方案,许多小型实验项目得以落实。比如,从限制农药使用到发展圈养以保护家畜,从而让肯尼亚马赛马拉保护区的马赛人停止报复性杀戮。

本卷中的照片横跨欧洲及非洲大陆。欧洲对协会而言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案例,它的商业发展实际上源承于欧洲先驱,又有美国意味浓厚的雄心参与。协会成立时,欧洲是所有地区中开发最彻底的,想要发现一座山脉、一个部落、一处遗迹或者一条河流的几率极低。但这

并不妨碍《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对欧洲那些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的部分的重视,他们也特别强调那些国家的亚文化,其中民族服饰是他们特别偏爱的主题。

从起始的第一年起,协会就倡导非洲的开发,不仅将其视为一个地域,而且是一个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全新的文化集合。它主要赞助两大分类的调查:动物种类与人类学。在人类学中协会促成的最著名的案例是与利基家族的合作,赞助了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及玛丽·利基(Mary Leakey)的田野调查。1959年,在一次坦桑尼亚北部奥杜瓦伊峡谷(Olduvai Gorge)的考察过程中,玛丽·利基发现了一枚类人头骨,它隶属同时具有类人猿与人类特征的早期种族。头骨的历史被鉴定为距今175万年,从而革新了人类起源的理论。

当时,梅尔维尔·贝尔·格罗夫纳(Melville Bell Grosvenor)(他是《国家地理》杂志第一位全职编辑的儿子)已经担任了两年主编,他意识到了利基夫妇发现的重要性,于是邀请他们撰写了一篇文章,这成为他为协会所做的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协会随即拨出款项,让利基夫妇的田野调查有了更多的空间。这笔专款持续了30年之久,但很快以两种方式得到了回报。



第2页
B. 安东尼·斯图尔特
马萨诸塞, 1954 年

玫瑰景观下的世界——事实上那是一块由绿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杂染而成的玻璃，它迎接到访地球馆的参观者，是波士顿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图书馆的别致景观之一。地球被镶嵌在直径约9米（30英尺）的铜框里，呈凹面球形，因此参观者不会看到一个变形的世界。

第4—5页
科顿·库尔森
瑞士, 1985 年

瑞士保守的阿彭策尔（Appenzell）区域，一路沿着阿尔卑斯山脉的绿色植被绵延而下，山褶和山谷间仍然留存了曾一度盛行于阿尔卑斯山间的传统：身着红色马甲的男人依然在夏日将牲口赶去高地牧场，在冬天把它们领回低地休养；身着传统服饰的女人依然忙于刺绣；山笛和约德尔调依然在山谷间起落回响。

第6—7页
汉斯·希尔登布兰德
埃及, 约20世纪20年代

至少从希罗多德（Herotodus，约公元前484—前425年）的年代开始，尼罗河就成了非洲的北门。它消逝已久的文明是一座永恒的丰碑，深具浪漫色彩的魅力丝毫不减，吸引着千秋百代为其折腰。而与大金字塔相伴的狮身人面像，是那里被描绘最多的景象。这是一张早期自然呈色的照片。

第8页
詹姆斯·E. 罗素
华盛顿特区, 1969 年

《国家地理》杂志的温菲尔德·帕克斯（Winfield Parks）坐在成套的摄影装备后面。这些装备是那个时代一个《国家地理》杂志摄影记者的标配：几个尼康（Nikon）F单镜头机身，附有各种型号的镜头，从鱼眼广角镜到榴弹式望远镜头（howitzer-like telephoto）一应俱全。用于测试曝光和交友的宝丽莱、频闪灯、测光表、三脚架、笔记本，当然还有最重要的胶卷，数量充足的柯达克罗姆（Kodachrome）及埃克塔克罗姆（Ektachrome）彩色胶卷（柯达公司生产的最著名的两种反转片）。这样，才能填满这堆耐用的哈利伯顿（Halliburton）牌铝合金手提箱。



第9页
罗伯特·F.西森
华盛顿特区，1948年

《国家地理》杂志摄影记者J.贝勒·罗伯茨（J. Baylor Roberts）正在检查他的摄影装备，他即将前往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那是由协会赞助的考察。在他面前铺开的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工具箱装备：左边是柯达Ciné-Special 16毫米摄像机，中间是35毫米徕卡（Leica）测距仪，带有可替换螺丝型接环镜头，右边是中号型双透镜禄来（Rolleiflex）牌相机。他正在检测手中的大型相机，可能是一台格拉菲（Speed Graphic）——摄影记者的最爱。

第10页
路易斯·马登
墨西哥，1936年

头戴太阳帽、一身崭新热带装束的路易斯·马登时年23岁，他身后是奇琴伊察（Chichén Itzá）金字塔的城堡埃尔卡斯蒂约（El Castillo）。那不仅是他第一次出国考察，而且也开启了他《国家地理》杂志任职期间收获最丰厚的一次旅行。马登不仅文风典雅，精通5种语言，而且还为杂志采用35毫米摄影技术推波助澜，挂在他脖子上的徕卡相机正是佐证之一。

第11页
托马斯·阿伯克龙比
沙特阿拉伯，1971年

托马斯·阿伯克龙比裹着一身白色的伊斯兰教朝圣服（ihram），坐在一块位于麦地那（Medina）“先知清真寺”（Mosque of the Prophet）上方的魔毯上。托马斯·阿伯克龙比在1955年加入了《国家地理》杂志，是一名精通多种语言的作家及摄影师，后来成为杂志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记者之一。他是新一代摄影记者的代表，毕业于应报业需求而设立的学校，他改变了杂志的面貌。他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个“蓝眼睛穆斯林”成为著名的中东地区专家。



第一，包括利基夫妇、他们的儿子及几个孙辈在内的利基家族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他们在东部非洲地区所取得的成绩。第二，路易斯·利基让另外几位科学家走入协会视野，正是在路易斯·利基的引荐下，《国家地理》杂志与三位专攻灵长类的权威科学家建立起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直到1985年去世前一直专注研究山地大猩猩的黛安·福西（Dian Fossey），专注研究红毛大猩猩的比鲁特·加尔迪卡斯（Birute Galdikas），以及专注研究黑猩猩行为的简·古多尔（Jane Goodall）。

简·古多尔于1960年在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位于东部非洲，为世界第二深湖）附近的贡贝（Gombe，位于坦桑尼亚）黑猩猩保护区开始了她的研究。“在我田野研究的最初两个月里，”她写道，“我常常感到绝望。每天清晨我独自出发，勘察一座又一座山谷，沿着狭窄的山涧前探，披荆斩棘，

攀爬陡峭的山坡。有时我会发现一群在树丛中喂食的黑猩猩，但很难在这些害羞的猩猩离开前接近它们。我常常听到猿啼喧闹，但它们往往在我追上之前就踪影全无。每天黄昏时，我不得不步履艰辛地返回营地，沮丧不已。”这段话出现在简·古多尔1963年第一次为《国家地理》杂志撰写的文章里。她始终勤勉，她的故事也非常鼓舞人心，50年之后，她仍然在研究黑猩猩。

简·古多尔的发现与其他摄影师的作品一起存世，比如朱伯特一家（Jouberts）、弗兰斯·兰廷（Frans Lanting）、迈克尔·尼科尔斯（Michael Nichols）等。这个充满了奇迹、发现和改变的永恒故事会随着时间继续。这是所有杰出的《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们一起诉说的有关进化和发展的故事，这是我们永不会厌倦的故事。

大局

马克·科林斯·詹金斯

《国家地理》杂志如何革新摄影技术并改变说故事的技巧。

“摄影师的装备是他本人情绪和想象力的延伸。”《国家地理》杂志的詹姆斯·L.斯坦菲尔德 (James L. Stanfield)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曾这样宣称，而他完成一次任务的典型装备至少包括 9 台相机、14 个镜头、2 台测光表、500 卷胶卷，以及频闪灯和泛光灯。不过，和斯坦菲尔德的同事罗伯特·F. 西森比起来，这套工具箱只能说是轻巧。一次去厄瓜多尔丛林考察时，西森运了重达 454 千克的器材过去，他在一朵花旁边守了 19 天，希望能看到一种特别品种的蝴蝶栖于花上的景象，可惜最终失望而归。

为《国家地理》杂志摄影从来都不是件轻巧的工作。虽然第一期杂志里就出现了相片，但他们最初并非因为对摄影技术怀有特别的崇敬，只是比起木材、钢材、黄铜等材质，用这种半色调的凸版印刷方式来复制图片最

为便宜而已。即使杂志早期最具影响力的编辑之一吉尔伯特·H. 格罗夫纳 (Gilbert H. Grosvenor) 特别鼓励将摄影定为申请进入协会的途径之一，他仍然不得不随时尽可能去获得自然奇迹或者土著人扔茅这样的照片。他获得照片的主要渠道是政府办公室和图片代理社。有时他也会从友好的外交官、饱经风霜的探险家、富有的旅行者、浅薄的外派员 (dilettante expatriates)、流动的自由职业者手上获得资源。

除了这种偶尔为之的资料积累之外，格罗夫纳开始打造杂志的风格，特别强调“风光魅力”，并着力描绘生活在偏远地区人们的习俗和服饰。但直到彩色照片出现、杂志开始组建摄影记者的队伍之后，《国家地理》杂志独特的摄影风格才得以渐渐独树一帜。

手绘照片最早出现在杂志 1910 年的 11 月刊中，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然色彩”的照片才开始在杂志中盛行。而从“彩色底片党”

(Autochromists) 拍摄的那些静谧的欧洲风景来看，那场战争好似从未发生过一样，他们之中包括朱尔·热尔韦-库尔泰勒蒙 (Jules Gervais-Courtellemont)、汉斯·希尔登布兰德、威廉·托宾 (Wilhelm Tobien)、古斯塔夫·赫林 (Gustav Heurlin)，他们都被格罗夫纳训练成了《国家地理》杂志的骨干。这种呈现的方式部分也源于慢速曝光时代卢米埃彩色底片 (Lumière Autochrome) 的需求——即以 f8 档在强烈的阳光下放置 1—2 秒，那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的彩色制式玻璃板底片。这些照片也赋予饱受蹂躏的战后欧洲一种表面上的平静感。慢速曝光也需要拍摄对象维持僵硬的姿势，如今看来别有一番奇特的魅力。虽然雕铣 (engraving) 和印刷的成本都非常昂贵，《国家地理》杂志仍然很快成为世界上最擅长使用彩色底片的出版物之一。色彩成了它最突出的标志。

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格罗夫纳几乎可以在日益稳固的荣誉上高枕无忧，因为他作为一个为杂志摄影而辛勤工作、也能拍到预期水准的摄影记者，已是完全受之无愧的。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那





第12页
B. 安东尼·斯图尔特
英国，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

托尼·斯图尔特（“托尼”为“安东尼”的昵称）手持他从不离身的相机，蹲在诺福克（Norfolk）欣厄姆（Hingham）的孩子中间。欣厄姆曾是新英格兰朝圣者祖先的家园。“B. 安东尼·斯图尔特”是托尼的作品署名，这个名字成了他那个时代产量最高的《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的代表，几乎没有一期中没有他的作品。他在自己的领域中是如此多才多艺，所以在他的事业即将落幕前，协会授予了他一个荣誉称号：首席摄影师。

第13页
弗兰克·肖尔
中国，1958 年

金门，一座中国岛屿。采访时，摄影师威尔伯·E.加勒特（Wilbur E. Garrett）吸引了一群对他的两台尼康相机好奇不已的孩子们。对于照片以及构图的眼光逐渐将他推上了编辑的位置，他在职的那10年（1980—1990年）也证明了他的创新与进取精神。

第14页
德斯·巴特利特与珍·巴特利特
亚利桑那，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澳大利亚籍摄影师德斯·巴特利特（Des Bartlett）坐在一辆旅行轿车的后挡板上拍摄一群腾起的雪雁，他和妻子珍·巴特利特（Jen Bartlett）发现它们的时候，它们还是一群无父无母的小雁。他的图片报道记录了这群雪雁的迁徙，从哈得孙湾（Hudson Bay）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Mississippi Delta），长达4023千米（2500英里），报道刊登在《国家地理》杂志1973年的12月刊上。他在电影上的成绩也让他赢得了艾美奖最佳摄影。

第15页
华莱士·W. 纳丁
加拿大，1919 年

吉尔伯特·H. 格罗夫纳正在准备拍摄他岳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在加拿大布拉多尔湖（Bras d'Or Lake）上的水翼船实验，他在调整镜头光圈。格罗纳夫是《国家地理》杂志最具影响力的编辑，他主导了杂志半个多世纪（1899—1954年），在他任职期间，他在页面上加入大量照片——各地的风景，把一本岌岌可危的出版物改造成了一个国家机构。



些人——也仅有那些人——成了如今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的人。

他们分为两大阵营：一组是简单纯粹的摄影师，他们把时间全部投注在相机和镜头上，基本顾不上打字机。他们中最突出的代表是B.安东尼·斯图尔特，他对色彩的敏感度和构图的能力举世无双，而在他42年的职业生涯中，图片下方他的署名次数远远高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任何摄影师。另一组由文质彬彬的“域外编辑团队”（Foreign Editorial Staff）组成，这个名字意味着他们需要长途航行抵达远疆，需要用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次任务。

梅纳德·欧文·威廉斯（Maynard Owen Williams）、W.罗伯特·穆尔（W. Robert Moore）和路易斯·马登是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都极具语言天赋，比如路易斯·马登，他能说5种语言，而且他们都必须具备方向感，因为他们得到的指令往往会变成“跟着直觉走”。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身兼作者之职，有时还要把电影拍摄的任务一并扛起。

不管隶属于哪一支阵营，每个摄影师都有他的行军装备。专制的图片总监富兰克林·费希尔（Franklin Fisher）有一条格言：“一张理想的《国家地理》杂志照片应当能引人瞩目。”他要求那些底片从前到后都调整到“针尖般锐利”（指一部相机与镜头所能达到的最佳锐度），无论是什么理由，都不可以在镜头中移位。为了达到这个效果，费希尔为他的下属们制备了一系列的大型带三脚架的林好夫（Linhof）牌相机和格拉弗莱克斯（Graflex）单反相机，一台中型双透镜禄来牌相机，以及一台起初不怎么入他眼的35毫米徕卡测距仪。为了满足找到一种能真正捕捉到动态的彩色制式的无尽渴求，《国家地理》杂志早已抛弃了彩色底片，转而重用35毫米柯达克罗姆反转片。这种反转片诞生于1936年，杂志在两年后开始使用，它是那个时代的底片中能够满足必要速度和色彩效果的一种。《国家地理》杂志是第一家全心全意采用35毫米相机和柯达克罗姆胶卷的出版物，这种组合革新了摄影技术。

没有其他胶卷能更好地呈现风景的色彩了——不过对富兰克林·费希尔而言，“色彩”特指红色。早在1948年之前，当杂志中的彩色照片数量第一次超过黑白照片时，翻动页面时不会有人错过红色。它无处不在：红色



衬衫、红色帽子、红色毛衣、红色围巾、红色猎装。一点红色就能让其他色彩都更为生动，加上“人性化地理”的编辑理念（即每张照片中都要出现人物），红色成为那些柯达克罗姆胶卷记录下的喜气洋洋的旅行日志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一度也曾是《国家地理》杂志的风行主题。

渐渐地，时间翻过了新的一页。1957年，原视觉总监的儿子梅尔维尔·贝尔·格罗夫纳接过了父亲的交接棒，统掌杂志。他本身是一个入行多年的灵活的摄影师，他组建了一支年轻的摄影记者骨干队伍，他们都在专门学校中受过训练，深谙高速新闻工作的原则。他们中的带头人是比尔·加勒特（Bill Garret，即威尔伯·E.加勒特），他后来也成长为杂志的编辑。这一梯队还包括另一个未来的编辑，梅尔维尔的儿子吉尔伯特·梅尔维尔·“吉尔”·格罗夫纳（Gilbert Melville “Gil” Grosvenor）以及年轻的托马斯·阿伯克龙比，他们聪敏、恣肆、极富想象力的照片让杂志翻开了全新的篇章。托马斯·内比亚（Thomas Nebbia）、迪安·康格（Dean Conger）以及温菲尔德·帕克斯很快重新定义了杂志的风格：摆拍减少了，民族服饰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自然的感觉，更大程度利用自然光线，更多关注图案以及拍摄对象间的相邻关系。帕克斯摸索出了“富有长久意义的照片”，托马斯·内比亚则一直为“让人不由得反复端详”的照片努力。